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

# 战后日本政界 战争观研究

The study in the war views of  
Japanese political circles

王希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王希亮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ISBN 7 - 80190 - 736 - 1

I. 战… II. 王… III. 侵略战争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IV. 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681 号

### 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

---

著 者 / 王希亮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65232637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赵慧芝

责任校对 / 肖 丰

责任印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8

插图印张 / 0.25

字 数 / 420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736 - 1/K · 207

定 价 / 40.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序 言

步 平

2001年4月，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小泉纯一郎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后，立即宣称要在任上做四件大事：即修改宪法；重新解释“集团自卫权”；制定《有事法制》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当年8月13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即保守派所谓的“终战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他果然不顾国内外民众的反对，迈入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此后，他不仅连续四次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操纵国会通过了《有事法制》，打着“集团自卫权”的旗号向伊拉克派出海陆空自卫队，同时，以修改宪法第九条为主要目的的保守派的改宪活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歪曲历史的扶桑社的教科书再次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通过，这一切都引起亚洲以及全世界的瞩目和强烈抨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世界各地都在呼吁

和平与发展，声讨和反对侵略战争的时候，日本列岛却不断传来不和谐的声音。为什么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之久，围绕着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当局始终不肯像德国那样，谦虚地反省，由衷地谢罪呢？为什么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日本朝野上下不断掀起波澜，炮制歪曲事实真相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存自卫论”和“亚洲解放论”呢？究其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日本执政当局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同志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研究，撰写了这部关于日本政界战争观问题的专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日子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王希亮同志曾受国家教委公派赴日学习，后来在日本学习、工作多年，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并有驾驭日语的能力，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日本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的研究，所以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课题任务。

作为这部专著的“序言”，我想首先有必要围绕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向广大读者揭示日本战后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之举及其实质。人们知道，1952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生效后，围绕着战争性质、战争责任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日本执政当局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颠倒历史，为战争翻案的活动，出台了一系列为战争“正名”和推卸战争责任

的法规、政策和举措。1952年，日本众议院就出台了“关于BC级战犯”的决议，决定要采取“迅速而适当的措施”解决BC级战犯的在押问题。1953年8月，众议院又做出更强硬的决议，声称：

根据国民的恳请，如不全部赦免战争犯罪的受刑者，有伤国民的感情。

为达到早日释放战犯的目的，日本政界领导人置亚洲各国及广大民众的意见于不顾，一方面敦促国会，一方面游说西方各国。结果，从1955年开始，日本当局以患病年迈为由着手释放罪行累累的A级战犯。到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昭、东乡茂德、白鸟敏夫等三人外，其余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他们中有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桥本欣五郎（陆军大佐、“樱会”头目）、贺屋兴宣（东条内阁藏相、后来的遗族会会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参谋总长）等13名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这些人连同此前被美国占领当局释放的岸信介、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几十名准A级战犯嫌疑人大多加入保守政党的行列，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

除战犯外，因为战争责任被占领当局明令开除公职的原日本政界人物、旧军人、司法、警察人员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比较著名的人物有鸠山一郎、河野一郎、

三木武夫、三木武吉、大麻唯男、安堂正纯、大久保留次郎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日本政府担任过重要职务甚至总理大臣。

另外，一大批恢复公职的旧军官、警察官、司法人士等也分别进入自卫队、警察或司法机关重操旧业。特别是一部分与臭名昭著的 731 细菌部队有密切关系的人，甚至是细菌部队的骨干也在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的情況下，进入日本政府机构以及官办的医疗卫生、保健、防疫医学研究、医学教育、绿十字协会等机关，继续担当着重要职务。如 731 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曾担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731 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曾任北海道副知事；731 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曾任防卫厅主任研究员；1644 部队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战后曾任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长和第七任所长；731 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可以想见，这些人根本不会自觉地反省和认识战争责任，更不会主动地向被害国家和人民谢罪了。

在酝酿释放战犯的同时，1952 年 5 月 2 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歿者追悼式”，吉田茂总理在追悼会上致辞说：

今天，我们举行支那事变以来全国战歿者追悼

式，祈祷他们的冥福，每当想起因为战争而负伤的许多人和仍滞留在异邦的近 30 万同胞时，本人就禁不住百感交集。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他们的生命奠定了和平的基础。

从吉田茂这段短短的致辞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当时日本政府领导人的战争责任意识。

第一，他们所悼念的战死者仅仅是指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近 300 万的日本军人，不包括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而牺牲的 3000 万以上的亚太国家、地区的战争牺牲者，这种典型的“内向型”追悼理念从吉田政府始，并被后来的历代自民党内阁所继承。直到社会党的村山富市组阁后，这种“内向型”的追悼形式才有所改变。

第二，称颂战死者“奠定了和平基础”、是“为国殉难”。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田中耕太郎在致辞中称，战死者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尽到忠诚国民的义务，为了祖国而献出生命的”，“这种牺牲符合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是最高的德行”。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也美化战死者是“为了东洋和平，勇敢赴难的忠诚之士”。吉田内阁的领导人对战死者的评价成为后来各届内阁效仿的“模式”，直接影响到日本官方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直到今天，这种认识仍有广泛的市场。

第三，不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依然坚持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

由大本营颁布的“包括支那事变称作大东亚战争”的旧说，把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限定在 1937 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此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把追悼的范围限定在“支那事变”以来。

此外，战后的日本内阁成员从来没有停顿迈向靖国神社的脚步。美国占领期间，曾颁布了《神道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必须同靖国神社断绝“特殊关系”，“宗教同国家分离，防止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但是，东久迩稔彦组阁的当年（1945 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接任的币原喜重郎在任期间参拜了两次。吉田茂参拜了 5 次。岸信介参拜了两次。其他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福田纠夫、铃木善幸、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在任总理大臣期间都多次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曾根康弘还在 1985 年 8 月 15 日首开战后总理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1978 年 10 月 17 日，靖国神社竟将东条英机等 7 名被处决的战犯，连同后来死亡的梅津美治郎等 5 人、未审判时死亡的松冈洋右等两人，总计 14 名 A 级战犯秘密合祀。

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悼念“亡灵”，一个重要的心理是对日本的战败耿耿于怀，对阵亡的炮灰予以“慰灵”，进而激发国民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继承日本所谓的传统主义的“皇国精髓”。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政界要员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反映在教育战线上，战后日本先后三次掀起攻击历史教科书的逆流。第一次是在 50 年代初期，执政的民主党抛出系列的《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小册子，专门挑剔各级学校所谓的“偏向”教育的典型案例，攻击教科书“不符合国情”、“为中共和苏联唱赞歌”，“煽动工人运动”等，鼓吹恢复“国定教科书”制度。这以后，执政当局又先后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强化对教科书的审定。出台一系列与民主主义教育背道而驰的法规，甚至鼓吹修改《教育基本法》。在这种强烈的政府意志下，教科书开始出现“改恶”倾向。凡是涉及日本“侵略”的用语在审定时被一概强制删除，否则视为不合格。另外有关日本的战争犯罪，如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等也一律不准在教科书中出现。这种状况持续达 20 年之久，被称作“教育的冬天”。

到了 1982 年，文部省教科书审定机关将“侵略”改为“进出”，揭开了第二次攻击教科书的序幕。由于引起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严重交涉，使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国际化，日本当局不得不出台一个《近邻诸国条款》，表示在审定教科书时“应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然而，当时的中曾根内阁执意走政治、军事大国的道路，提出一个“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日本的政治路线转向新保守主义的轨道。所以在 1986 年，右翼团体“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课本《新编日本史》获得通过。以这部被称作“皇国史观教科书”的出笼为切

入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再度引起世人注目，国内外批判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声浪再度高涨。

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结束了自1955年以来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自民党再也不顾忌执政党时期尚存有一些的“谨慎”或“矜持”，索性以在野党的身份大唱起“大东亚圣战”的赞歌。当年，自民党要员组成“历史研讨委员会”，两年后炮制出笼全面肯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彻底暴露了自民党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在政界要员率先垂范的引导下，知识界历史修正主义团伙纷纷浮出水面，掀起了第三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他们以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制从军慰安妇、三光作战等日本战争罪行为突破口，攻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教科书是“自虐”，是“培养反日的日本人”，主张恢复日本历史的“光彩”和“自豪”，并于2001年推出了完全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

纵观日本战后围绕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所出现的倒行逆施，无一不同日本当局的认识、决策、政治走向相关，因此，如果不深入剖析日本政界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社会仍然顽固地坚持“大东亚战争”的立场，难以解释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那样，老老实实地反省，诚诚恳恳地道歉，认认真真地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王希亮同志的这部专著比较系统、准确并有独到之处地回答了这些

问题，在此，本人愿意郑重地向广大读者们推荐这部专著。

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乃至日本同亚洲诸国关系的一大障碍，作为学者，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冷静、科学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近7年之久的占领，出于冷战和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虽然宣判日本犯有“对和平有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但是，这次审判庇护了对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昭和天皇，开脱了一大批旧政权的官员、财阀和右翼巨头，没有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使日本的战争机器得以部分保存下来。接着，美国为了把日本拉进西方营垒，排斥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和朝鲜参加，不计苏联等国的反对，片面通过了《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该条约除第11条以外，几乎没有涉及战后处理问题，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就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包括对民间人的赔偿）做出有历史价值的决议。所以，旧金山条约签字后，随着日本同亚洲个别国家、地区的“单独媾和”，日本政界的领导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战争处理问题已经画上了句号，从此不必为战争责任问题再费周章。直到今天，冷战虽然结束，但是，日本继续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把“美国有事”当

作“日本有事”，日本出兵伊拉克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鉴于日本当局政治右倾化的不断加剧，我们不能期待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会在短期内得以解决，偏激过火的情绪或举动会使事情更糟，但忘记民族的耻辱，忽略历史教育，对日本歪曲历史的行径漠然置之的现象也值得注意。

第三，促进和重视民间的交往，包括知识、文化、教育、宗教等社会各界以及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是弥补中日两国民众的认识差距，消除日益深化的相互间的不信任感，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有效形式。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进行了共同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尝试，到今天已经初见成效，至少，这样的举动对于增进东亚各国学者和民间的交流和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中日战争以及中日关系的历史研究有必要继续深入，尤其是史实的调查考证，证据的收集，资料的抢救，档案资料的开放等都迫在眉睫。还包括科研规划的立项，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接续等，都是时代和责任赋予我们的不可掉以轻心的使命。

#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

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 目 录

序 言 .....	步平 1
第一章 美国占领时期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放弃 .....	1
第一节 “终战处理内阁”的战争责任意识 .....	1
一 “一亿总忏悔”论及其实质 .....	1
二 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调查会” .....	12
三 天皇退位论 .....	16
第二节 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东京审判与 “对日讲和条约” .....	19
一 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和反民主化逆流 .....	19
二 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	24
三 宽大和片面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 .....	34
第三节 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与沉渣泛起 .....	38
一 释放战犯，重新启用负有战争责任的政治家、 官僚以及旧军人、司法、警察等人员 .....	38
二 “内向型”追悼式及参拜靖国神社 .....	42
三 军人“恩给”制度的复活 .....	46
四 文化教育界的复古倒退 .....	50

五	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抬头 .....	53
六	旧右翼团体的复出及其特征 .....	59
第二章	日美安保体制下的反动政治回潮 .....	63
第一节	“55体制”的确立与修宪论的抬头 .....	64
一	“55体制”与保守主义政治 .....	64
二	反共排华的国策与修宪论 .....	66
三	岸信介上台 .....	73
第二节	岸信介内阁的倒行逆施 .....	76
一	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构筑反共排华的桥头堡 .....	76
二	对内施政的反动和倒退 .....	78
三	岸信介内阁同右翼势力的关系 .....	81
四	右翼势力对勤务评定、警职法改定斗争的 干扰与破坏 .....	82
第三节	新安保体制的确立与右翼促进运动 .....	84
一	安保斗争的掀起 .....	84
二	右翼势力的集结和促进安保改定运动 .....	86
三	右翼暴力活动及流血事件 .....	88
第四节	三池争议、安保斗争的余波及 右翼势力的反扑 .....	91
一	三池争议和右翼的介入 .....	91
二	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刺杀事件 .....	92
三	袭击中央公论社社长 中鹏二事件 .....	94
四	“三无事件” .....	95